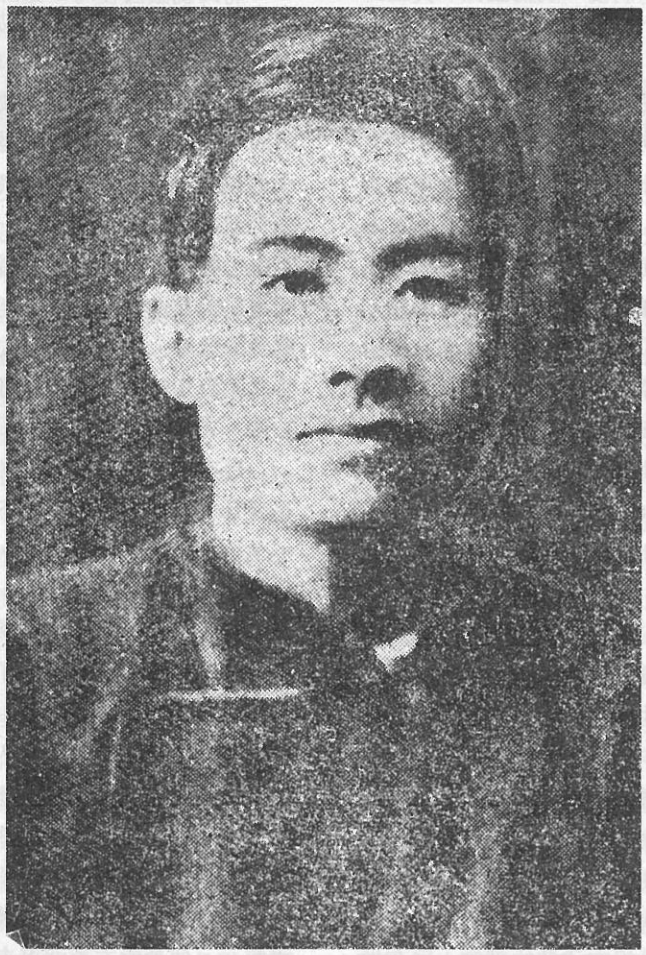
台灣葉脈上的慧星

蔣渭水



民國三十九年，荒涼而寂靜的六張犁公墓，矗立了一座高聳的墓碑，與忠烈祠遙遙相望。長眠於此的英魂，正是日據時代最具影響力、最能刺痛日據當局、最能喚起寂靜的民族與社會良知的革命烈士蔣渭水先生。

民前十九年（一八九一）蔣氏誕生於宜蘭，過了五年甲午戰爭失敗，腐敗無能的清廷把台灣割讓給日本，揭開了五十一年的台灣黑暗歷史。四十年後，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的前夕，一顆照亮台灣黑暗天空的明星殞落了。他生於日本侵略中國的前夕，死於日本另一侵略中國的前夕，似乎註定要與日本帝國主義周旋到底、鞠躬盡瘁、死而後矣的命運。

他生於一個小有名氣的相士家，幼年曾當過乩童，但是學習醫學、接受科學訓練後，對惡劣的風俗與迷信棄之如敝屣，甚至抨擊得不遺餘力。九歲時受業於家鄉宿儒張茂才，七年的傳統教育奠定了漢文基礎，培養了濃厚的民族感情。十六歲始進入公學校，接受日本教育，依當時學制，公學校要唸六年，但也只唸三年，便考入台北醫校（台大醫學院前身）爲公費生。醫校五年多釆多姿，學業總成績爲第二名，同時染上「政治病」常著文痛論日帝暴政。一九一一年身爲醫生的孫中山先生領導辛亥革命成功，遂使當時集全島優秀青年於一爐的

醫校學生洋溢著民族意識，學生之中，又以蔣氏的民族意識表現得最爲熱烈。在醫校時代，蔣氏不僅在校內曾因毆打日人而被禁足兩星期，曾擬定刺殺袁世凱計劃、發動國民捐，而且還超出校外，結合他校——國語學校及總督府農業試驗所的學生，在艋舺金和盛酒館舉行學生大會，或於和尚洲水滴庄舉行相園會議，痛斥日據當局壓迫，鼓吹革命精神。此時他發現：商業場所可以方便聚會，商業活動可作爲政治社會運動的合法掩護。因此創立了「東瀛商會」、「冰店」做爲政治活動的根據。醫校五年中，他至少扮演著三種不同的身份——是一名成績優秀的學生、是一個富有民族意識、民族正義者、同時也是一個「居心不正」的商人。雖然三個角色與特質截然不同，但是他竟能應付裕如，這些均賴他明晰的頭腦、果斷力，以及具有組織之性格，這些特性均可在他以後政治社會運動中窺見一二。

蔣氏於醫校畢業後，任職於宜蘭醫院內科，十一個月後，在大稻埕（現在延平北路一帶）創立大安醫院。五年中，業務蒸蒸日上，廣結人緣，但這些朋友僅限於私情上的普通朋友，公務上的同志，可以說全無，他過著無憂無慮的物質生活，但學生時代活躍的運動角色，卻漸漸褪去，以致自醫校時代產生的「政治熱」，不得不隱忍待時，他自稱這五年是一種無意義的生活，是他的「悲觀時期」，但是此時他將自己的性格，很自然地走向大衆化，了無痕跡。

民國三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西方的民族意識覺醒，民族自決的浪潮、澎湃洶湧，四大帝國的崩解（奧匈帝國、土耳其帝國、俄羅斯帝國與德意志帝國），誕生了六個新興民族國家，它們是波蘭、捷克、芬蘭及高加索三小國立陶宛、愛沙尼亞及拉脫維亞，戰後的歐洲由二十一個國家增至二十七個國家。

威爾遜的民族自決推波助瀾，在歐洲大陸有豐碩的成果，更如星火燎原，向著古老的東方世界蔓延，印度的甘地，倡導獨立運動，辛亥革命後的中國，雖陷於軍閥割據的局面，但是反帝國主義，爭取民族獨立的呼聲衝徹雲霄。醞釀已久的民族思想，窒息已久的中國人民，終於憋不住氣了，民國八年五四運動爆發了，是當時愛國青年爲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所發出的偉大怒吼，是爭取民族獨立所發出的歷史聲音，猶如平地一聲雷，振憾了世界，刷新了中國五千年歷史，這是一個歷史的時刻，是中國人深以爲傲的年代。

蕞薾的日本經過中日戰爭、日俄戰爭兩次勝利後，成爲亞洲一大強國，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經濟空前繁榮，儼然一個暴發戶，手足無措，暴發戶僅管暴發戶，仍難逃民族思想，民族思想的波及在日本本土有個轟轟烈烈的成果，民本主義蔚爲思想的主流，日本軍閥的專橫跋扈在本土不能得逞，便轉向他的殖民地——台灣與朝鮮——施展他醜陋的嘴臉，集大權於「總督」一身，壟斷台灣的資本，壓榨台灣的經濟，埋葬了台灣的文化，日語與醫學教育就是日據時代，本省教育的兩大角色，尤其是教育上「日台二元」歧視政策，造成了台灣人與日本人民族對立的主要原因。

就在五四運動前兩個月，朝鮮半島爆發了獨立運動，台灣與朝鮮同是日本殖民地，台灣財政已經獨立，朝鮮仍需日本補助，台灣經濟較朝鮮進步，受教育的比例較朝鮮爲多，爲什麼朝鮮卻享有較台灣爲多的政治自由，他們有朝鮮人自辦的報紙，台灣卻有包辦行政、立法、司法於一身的總督，尤其是沒有武裝的朝鮮人民在世界潮流的鼓舞之下，竟敢發動獨立運動，公開要求獨立，無懼於與帝國主義生纏活鬥，這些均足以使在日本的台灣留學生深刻反省與覺悟。

辛亥革命的鼓舞，世界潮流的洗禮，日本本土民本思想的薰陶，發憤圖强的精神油然而生，台灣的殖民政策，朝鮮獨立運動的刺激，使他們激昂的情緒滙成一股洪流，於是民國八年年底，在東京組織了「聲應會」、「啓發會」民國九年元月十一日，在台灣近代政治社會運動史上佔著極重要地位的「新民會」便誕生了。

東京的留學生點燃了日據時代非武裝的台灣政治社會運動的火炬，這把火炬便持續者傳遞「台灣議會請願運動」、「台灣文化協會」的成立，正是蔣氏政治社會運動生涯的一小步，台灣政治社會運動歷史的一大步。

蔣氏就讀醫校時，雖醉心於政治社會運動，但是，他的行動依據大多來自新聞報導及大陸同學口中的鼓舞，對於政治的理論，並未做更深入的研討，其原因有二：一則醫學課程並不輕鬆，一則日本當局嚴禁台灣同胞學習政治，資料來源缺乏，執業的五年中，精神生活消失了，這方面的研究當然未見進步，民國十年，當地重燃政治熱時，雖然雄心萬丈，但就當時其政治知識水準言，眞可說是「心有餘，力不足」。

幾次入牢房，正好提供他機會，不受任何牽掛，而可以靜下心來進修，他涉獵很廣……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交通、偉人傳記、文化主義、古文、醫學、宗教、文學、體育、歷史等等無所不包、讀完了他平生所喜歡而沒有功夫讀的書，由於他的好學不倦，入獄對他來說像入學，而且讀書的成績更好，滿足了他一度想放棄醫學，研習政治學的慾望，同時也紮穩了他的理論根基，開拓了思想範疇，增加了影響力，經過幾次「思想武裝」，使他能充裕迎接未來的一切戰鬥，使他的文筆更爲潑辣，更能鼓舞民心，這些效果，當然不是日本政府所能預料的。



第一次出獄，他在台灣人喉舌的台灣雜誌及台灣民報上發表了四十餘篇頗有見地的文章，直言不諱，對日據當局而言，確是相當尖銳而刺耳，但對被壓迫的台灣同胞，正是暮鼓晨鐘，普遍引起共鳴，甚至在監獄中的大流氓見他再度入獄，也尊敬地說：「文化頭的蔣先生來了。」同時對他優禮有加。這次出獄發表的文章，給日本當局很大的教訓，所以在他二度入獄時，沒收了他的紙、筆、墨，也不准他寫日記，並把他列爲最頭痛的人物。

再度出獄，即著手籌備文化書局，以漢文介紹「中國名著」，以白文專辦「勞農諸書」，陸續推出三民主義、建國方略、孫逸仙傳、歷史叢書、哲學專論、文化史、政黨史、東西文化及哲學的比較、社會學大綱、革命先烈墨寶、相片、傳記、各類書籍不下數百種，介紹農民新的耕作方法，以提高農民農業生產技術，開拓農民的知識領域，使農民多多關心自己在社會結構中的地位，進而得到一個合理的待遇，蔣氏在這一方面的努力，不遺餘力，是百萬農民，在黑暗痛苦中的一盞明燈，指引他們走向平坦的大道。這在蔣氏死後的哀榮，表現得最透徹。

文化書局推出的書，大都與這瞬息萬變的時代息息相關，不僅應時勢之要求，同時也盡到了「新文化介紹機關」的使命，「文化書局」不僅代表那時代的縮影，更是蔣氏提煉民衆黨指導原理原則的根據地，藉著文化書局的力量，傳播抗暴意識。使蔣氏成爲以後台灣最具影響力的政黨領導者。

蔣先生除了辦書局，灌輸民衆抗日思想外，更進而向群衆講演以具體的行動來表明他的政治運動，鼓舞農人、工人以自身的力量去從事農民運動與勞工運動，藉著巡迴演講團之助吸收了不少的成員，同時也鞏固了基礎。以一個年僅三十歲而沒有受過政治社會運動訓練的職業醫師，在「政治熱」冷却了六年後，重新參與政治社會運動不到十個月的時間就能有如此成果，不能不教人刮目相看了。這足以反應出蔣氏具有高人一等的吸引力，綜合力與判斷力。

這些努力終於有了成果。日據時代樟腦專賣，蔗糖由日人的製糖會社强制收購，大部份的稻米由日本政府搜刮，人民勞苦終年不能飽溫，台省出產的香蕉大部份送到日本本島供日本享用，手無寸鐵的農民與日本軍閥交易，價格被壓低了，斤兩被減短了，强制農民生產的農產品無理的拒絕收購，可憐的農民敢怒不敢言，無人可傾訴，沒有人同情他們，替他們說話，沒有人幫助他們，爲他們爭一個「理」，現在有了，有人來領導他們，有人來鼓舞他們，被壓迫的農民因而更加覺醒，更加向心，更加團結，以積極的態度要求農產品價格合理調整，要求稱量，主張肥料自由買賣及公示肥料成份分析，以消極的態度拒絕種種賣給日本工廠的農產品，農民



運動給政治社會運來注入了一支生力軍，也喚醒了一向沈寂的勞工界工人運動，洶湧澎湃，以排山倒海之姿出現，高潮迭起。

在爆發農民運動初期，青年學生運動早已有聲有色，日人平素的優越感及差別待遇，報刊雜誌的鼓舞，各種演講頻頻舉辦，青年學生的愛國情操，爆出了亮麗的火花。先後有台中一中罷學，台北師範休校、台南師範罷課、台北工商學生同盟罷課、台灣民黨出現，先後成立青年會、青年團讀書會、向上會，而且各青年會都擁有自己的青年歌。

工人運動也不後人，高雄鐵工所罷工、包裝女工罷工得勝、台南機械工罷工、新竹木工工友會成立、台北店員會成立、台北人力車工潮、嘉義工人二度罷工。台北、新竹印刷工人罷工……甚至連官營的工場亦惹起罷工風潮，共有千餘職工參與此項罷工，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

台灣民衆黨於民國十六年七月成立，到民國二十年二月遭受禁止處分，在這三年七個月的奮鬥過程，可以說是蔣氏把他的政治理想表現得淋漓盡致，他替民衆黨催生，同時也是「台灣總督府」、「分化政策」臨盆的主要障礙者，從民衆黨的籌劃創立到壽終正寢，他無時不刻不隨侍在側，他是民衆黨的主要指導者，主要也是由於他，民衆黨才被日本政府禁止，這種關係使民衆黨與蔣渭水之間變成了一種「臍帶關係」。當初與他共同奮鬥的「同志」，面臨此種局面，都成了「穩健分子」及「先覺者」，以迎合上級功成名就，澤及子孫，唯有他一而再，再而三鋃鐺入獄。榮華富貴誰不企求？但，賣國求榮，奴顏屈膝，決非一個大漢兒女應有的作爲！由於民衆黨在全島黨員大會通過指導原則原理及立黨精神指導下，不但對各種政治、社會問題和經濟問題提出具體的批判和適時主張，更隨政治運動的發展而將民衆黨的基礎向大衆紮根，促成各工會聯盟的成立，並訓練黨員，領導民衆從事民族運動，在禁止吸食鴉片及霧社事件上，更儼然以革命黨的姿態，通過島內外輿論向總督施壓力，總督府凜於這種大衆運動所形成的新形勢，在民國二十年將民衆黨禁止，就這樣年僅四歲的民衆黨便在悲壯慷慨中夭折了。

此後，蔣氏創立自治會，政治上主張自治主義，經濟上主張台灣人民全體之利益，而被當局禁止，蔣氏不服，又改名爲「台灣同盟」，仍主張「自治主義」，又遭禁止，於是，舊幹部再籌劃政治結社，創立「台政革新會」綱領訂爲「期實現台灣人全體之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解放」，雖然去掉了日本當局所不許的「自治主義」，但它的涵義却更爲深遠。但因使用「台灣人全體」及「解放」而被認爲是民族主義團體，而被日本當局禁止成立。於是蔣氏等人又將「台灣民黨」改爲「台灣民衆黨」將綱領修改爲：

一、確立民本政治。

二、建設合理的經濟組織。

三、改除不合理的社會制度。

日據當局此時方無異議，但明眼的人均可瞭解這只是在作「文字迷藏」，黨綱的本質是不變的。

在這段期間內，蔣氏提出民族運動路線以來所持態度的延續和演繹，「耕者有其田」和「大事業歸公共經營」等主張，這些思想均源自　國父孫中山先生。

台灣民衆黨成立時日據當局以兩個條件交換：一則蔣氏不參加台灣民衆黨，一則蔣氏若參加，順於宣言書等保証蔣君不能支配大勢，並聲明不奉民族主義的團體。蔣氏雖然只是台灣民衆黨財政部主任的中央常務委員，卻以隱形領袖的姿態領導著台灣民

衆黨，這是日本當局所料想不到的。

民衆黨期間有幾件大事不得不提：

一是民國十八年末開始的反對鴉片新特許運動：這是日據時代非武裝抗日運動中打得最漂亮的一仗，由於新鴉片令對秘密吸食者網開一面，爲取得新特許而報名的潛在煙癮者竟達二萬五仟人之多，顯示出日人毒害台灣同胞的猙獰面目，民衆黨便理直氣壯地從島內、島外，展開有系統的反對：

一、在島內以台灣民衆黨的名義，直接向總督府提出抗議，

要求警務局長的聲明，並展開反對新特許運動，得到各地醫師公會及水會的支持，並得到東京新民會的呼應，聲勢愈壯。

二、打電報給日本總理大臣及拓務大臣，要求命令總督府停止發給新特許證，並作成聲明書，分送日本重要報社以求響應。

三、致電上海中國國民拒毒會，要求聲援並請其轉報國際聯盟。

四、直接向國聯總部控訴，要求「速採取阻止方法」。

國聯終於派員來台，東京當局也命令台灣總督不准發給新特許證，於是吸食鴉片又成了犯罪行爲，保全了台灣同胞的健康及財產。

一是霧社事件：霧社山胞因平素不堪日據壓迫，於民國十九年十月二十七日以「過於被强制勞役」爲由，在台中師範畢業的花崗一郎領導下，率領三百壯丁，乘霧社公學校舉行聯合運動會時，包圍運動場，襲擊警察分室及各分駐所，將日本官民及學童共一百三十四人全部殺掉，因而造成震驚朝野，轟動國際的霧社事件。霧社事件發生後，總督府出動軍警與飛機，甚至以不人道的毒氣瓦斯進行屠



社檢束者在台灣民衆黨本部為最後紀念

殺，歷時兩個月，方才事變敉平，在激戰過程中，起事山胞無一人投降，最後全部捐軀成仁，這種犧牲精神使霧社事件成爲日據晚期台灣最壯烈的武裝抗日運動。霧社事件發生後，總督府唯恐搖動民心，一味加以掩飾，台灣民衆黨爲求案情大白，卻一意加以揭發。由新鴉片特許運動得到的經驗與領悟，民衆黨也從內外兩方面進行，對內不斷報導霧社事件的新情況，對外更致電日本內閣與大衆黨，要求派員調察，於是「霧社事件」不再是一個單純的地方問題，而成了政治問題，於是問題的中心便移到中央政界去了。因此，愈使蔣氏成了台灣總督府的眼中釘、肉中刺了。

民國十九年，民衆黨經歷一次內部分裂，「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的成立，於是民衆黨再改組，新綱領的精神已由抽象的涵義變爲具體的要求，其主張是一種「以農工爲中心的民族運動」，較舊政策更富於民族精神。

新綱領政策於大會通過後，台灣民衆黨即遭總督府禁止，稱台灣民衆黨係過去甫行結社即被取締之台灣民黨後身，成立以來，領導權漸爲强烈的民族主義者蔣渭水一派所把持，運動日益矯激，徒出反母國、反官的態度、阻害內（日）台融洽，最近行動，如鴉片問題的讒誣，霧社事件的揭發，仿效青天白日旗做爲黨旗，對中華民國的追慕，漸漸露骨地表現出民族反抗的民族運動，稱讚中華民國急速整頓之甚於日本維新，使用不遜而矯激的言論，益暴露民族自決主義的企圖，此回修改的綱領政策若加以仔細檢討，便可看出民衆黨的指導精神，係以民族運動爲緯，以階級鬥爭爲經，竟有公然反對總督政治，要求壓迫殖民地民衆之諸惡法即時撤發，並要求設立台灣人本位的聯業介紹所，台灣人本位的免費宿泊所，治療所及疾病的主張，這些主張雖抹殺民族運動的文字，卻可斷定爲民族運動的表現，而綱領之「爭取被壓迫民衆的政治自由」，也「暗示强調殖民地的獨立」，如此以「加味的民族運動爲目的的結社」，實「違反我統治台灣的根本方針，妨害內台融合」　這正是「不得不嚴正處分」並「禁止台灣民衆黨的理由所在」。

台灣民衆黨於民國二十年二月十八日遭受禁止處分，同年八月五日，蔣氏病逝台北，民衆黨爲蔣氏一生最光輝的時期，蔣氏在民衆黨被解散後不久即逝，可說蔣氏死於生命最高潮的時刻，急流勇退，留下世人不可磨滅的印象。